

# 跨文化视域中的圣经文学研究

梁 工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圣经》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流传的。在学术发展史上,“圣经文学研究”的内涵渐趋丰富,从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进而借助比较文学和各种现代文论提供的方法,探讨“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并对《圣经》进行多维度的现代观照。

关键词:圣经文学;跨文化传播;多元阐释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3)05-0078-04

## The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Transcultural Horizon

LIANG G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Prov.,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Bible has been spread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holastic development, the intension of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has been changed gradually, first from study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 to explaining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d then, to inquiring into the biblical elements in world literatures, and to making multidimensional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on it with various method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Key words:** biblical literatur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从《旧约》正典尚未成书之际,《圣经》最早形成的部分“摩西五经”或律法书就经历了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希腊文化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的背景下,为了使日常交际语言已经充分希腊化了的犹太民众不至于丢弃本民族文化传统,一批深谋远虑的犹太文人就将“摩西五经”从其母语希伯来语翻译成当时流行的通俗希腊语,使之不仅能被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读懂,也能被希腊化世界的其他读者所了解。

在今日世界,凡有文字的地方几乎都有用该种文字译成的《圣经》,然而,除了极少数教牧人员和专家学者钻研用原文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外,所有读者都在阅读带有种种异质文化要素的《圣经》译本。因此,要想全面理解始终处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圣经文学,就必须投入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

### 1. 《圣经》的跨文化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0年来的基督教发展史就

是教会的传教史和《圣经》的传播史。由于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和教义皆见于《圣经》,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传播圣经。伴随着传教范围的扩展,《圣经》的翻译工作也在不断发展,2000年来的总趋势是:语种和版本愈益增多,译文的含义日渐精确,语言风格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文字趋于简明易懂,影响越来越广泛。

尽管教会译经的主观意图是传教而非传播文化或进行文化交流,但译经活动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传播的性质。这是因为:其一,《圣经》的内核或深层观念固然是宗教信仰和神学教义,总体而言它却是古犹太和初期基督教文化的总汇,所以,译介《圣经》其实是从各方面传播古犹太民族和初期基督教的文化。其二,《圣经》体现的外来文化进入异质文化领域之际,必定会引起两种文化的深层冲突和磨合,在很长时期中遭到异质文化的顽强抑制。为了削减对方的抵触情绪,教会解经家不得不寻找两种文化的相通点和神学观念的相似处,对其

收稿日期:2002-12-25

作者简介:梁工(1952-),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圣经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万方数据

进行种种比附,以使对方相信天外来客其实是一位“陌生的老朋友”,从而打消疑虑,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位外来者。欲达到这一目的,既使自己的宗教本土化,也用对方的异质文化要素充实己身,传教士必须深入考辨异族文化传统和宗教观念,而这方面的工作实质上就是比较文化研究。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等都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化,以便推行能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传教方略。这批西方汉学家对儒学皆有精深了解,艾儒略甚至被中国士大夫尊为“西来孔子”。其三,传教士为了实现其宗教目的,在译介《圣经》的同时也常辅以其他文化活动,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耶稣会士把望远镜、三棱镜、钟表等西洋器具和天文、数学、历法、水利法、测量术等近代科技引进中国,新教传教士把近代教育、医疗和书刊出版制度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创办学校、医院和出版社,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可见,《圣经》在世界各国译介的过程就是古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流传过程,它不仅促进了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带动了发达文化向落后地区的传播。在这一艰难的文化磨合过程中,古犹太—基督教文化与世界各族文化程度不等地交融互渗,对各族文化传统的嬗变发生了种种局部或全局性的影响。

## 2. 走向跨文化视域的圣经文学研究

了解了《圣经》跨文化传播的史实,观察“圣经文学研究”内涵的不断扩展就易于进行了。《圣经》既是宗教经典,也是古犹太和初期基督教文化的百科全书。就其百科全书性质的一个侧面而言,它是一部文学著作,体现了古犹太民族独特而杰出的文学天赋,展示了他们多方面的文学成就。

把《圣经》视为“文学著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暂时无视其“宗教经典”的性质,回避其神学教义问题,而把它当成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托尔斯泰小说同类的文学作品。既然是文学作品,它就与文化史上的其他书籍一样,也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是一部“由生活在确切时代的真实人物所撰写的作品选集。如同所有其他作者,这些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当时可资表达思想的文学形式,逐步写出这批作品;它们符合普遍适用的一般文学原理,故可以被所流传之地的人们阅读和鉴赏”。(Gabel & Wheeler, 1986)这种见解与“圣经神授”的宗教观念未必相悖,因为它只是对其“启示性”的源头避而不谈,而未否认《圣经》作者的“灵感可能确曾得到过上帝启示”。

《圣经》既然是文学著作,“圣经文学”一语就有了合理的依托。然而,什么是“圣经文学”,研究者的理解并不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认识相对狭窄,以为该语所指仅仅是《圣经》中一批富于纯文学意味的片断,如叙事故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该隐杀弟”、“挪亚方舟”、“亚伯拉罕款待三位天使”、“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以扫”、“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摩西的故事”、“参孙的故事”、“路得和波阿斯”、“扫罗和大卫”、“所罗门断案”等,或诗歌“摩西之歌”、“底波拉之歌”、“大卫哀悼扫罗父子”、“马利亚的尊主颂”等。这些作品或是情节生动的故事,以真切感人的心理描写塑造人物,以精巧的结构布局谋篇,以多样性的修辞技巧营造效果;或是激情澎湃的诗歌,以特定的体裁和韵律抒发情感,以当时流行的隐喻和象征述说人生和历史的哲理。后世读者能被它们所吸引,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现代学者看来,它们仅仅是狭义的圣经文学,即“圣经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而不是“作为文学的圣经”(the Bible as Literature)。(同上,14)自古就有人从这方面研究《圣经》,如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教父奥利金把《雅歌》解释成男女对唱的戏剧,12世纪的犹太拉比伊本·以斯拉提出《雅歌》中有所罗门、书拉密牧羊女、她的乡间情郎三个人物等。1753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洛斯(Robert Lowth)发表《希伯来圣诗讲演集》,卓有成效地考察了《圣经》中的希伯来诗歌,首次提出其基本体裁是平行体,这一成果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圣经文学的兴趣。

狭义的圣经文学概念固然有助于阐扬《圣经》的文学特质,却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它把读者的目光引导到最具吸引力的文学篇章上,难免使人忽略《圣经》的其他内容,尤其大量枯燥乏味的章节,留下顾此失彼、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按加百尔(J. B. Gabel)的看法,它还对所选段落“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原因是“所选段落能被收入《圣经》,不是因为文学特质,而是因为编纂者和宗教社团从中发现了宗教用途。……即使我们照样欣赏所选篇章(如雅各和以扫的故事)的幽默感、戏剧性和心理描写,这些品质或许在《圣经》时代也像今天那样为人们所欣赏,我们也必须毫不含糊地坚持这一点:它们能被收入《圣经》,价值绝不在于文学成就。如果把对雅各和以扫的描写只看成一篇精彩故事,就会犯严重的理解错误”。(同上,15)此外,狭义的圣经文学概念虽然承认圣经某些章节

和卷籍的文学地位,却未能从整体上评价《圣经》的文学性质。

为了弥补狭义圣经文学概念的理论缺失,从18世纪下半叶起,一批学者试图拓宽其内涵,主张该术语既指圣经中那些富于文学意味的章节,也指“作为文学的圣经”。这批学者认为,《圣经》本身就是一部由数十卷经籍汇编成的文学巨著,不但各卷有其写作、编纂、形成的特殊经历,整个《圣经》也有汇编、修订、增补、定型的复杂过程;《圣经》成书后被接连不断地誊录、抄写、翻译,并以文学研究者公认的各种方法进行阐释和解读,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学经典的际遇大同小异。18至19世纪,由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历史实证主义”模式在文学研究领域大行其道。学者们热衷于探讨经典生成的历史原因和过程,注重从作家的生平传记中寻找破译文学密码的钥匙。在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许多学者还强调复兴传统的重要性,将民族文学的源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典籍中。受此学术潮流的影响,一批学者也尝试以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研究《圣经》。

按照一种流行的看法,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是凯尔(K. A. Keil)出版于1788年的《经卷的历史研究及其价值》。在这部书中凯尔提出,要想解释文本,就要进入作者的内心,诠释他的原义,与他同步思考。释经者要像历史学家一样对外物不存任何偏见,尤其对作者的本义不存偏见。凯尔有一句名言“要用理解其他书籍的方式理解《圣经》”,强调释经者必须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不因文本神圣与否而改变态度,因为如果不把《圣经》作者当成实际生存过的人,就难以运用通行的方式解释《圣经》。(W. G. Kummel, 1972)这些见解孕育了后来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对19世纪上半叶一大批释经著作影响深远,包括迈耶(H. A. Meyer)从1829年开始出版的多卷本《批评与释经评论》。此后,各种“还圣经文学以历史原貌”的专著频频问世,如德莱弗(S. R. Driver)的《旧约的文学》(1891)、摩尔顿(R. G. Moulton)的《圣经文学研究》(1895)、艾博特(L. Abott)的《古希伯来人的生活 and 文学》(1901)、莫尔(G. F. Moor)的《旧约的文学》(1913)、贝弗(J. A. Bewer)的《旧约书卷的文学》(1922)等。这批著作关注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传统释经学所瞩目的教义神学,也不是狭义圣经文学所议论的圣经故事和诗歌,而是《圣经》各卷及全书的背景、作者、资料来源、形成时间及

地点、著书目的、所述事件的历史原貌,以及观念形态、文体样式、修辞技巧等。研究者的意图是再现《圣经》文本的形成经过,并重构《圣经》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运用的方法大体是文史学者研究其他古籍的方法,属于以反映论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考据法。所有这些著作所研究的,基本上都可纳入就扩展义而言的圣经文学,即“作为文学的圣经”。

前文已述,《圣经》自成书之日起就处于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其文化因子不断通过种种渠道渗透到世界文化肢体的各个部位。这一事实潜在地要求学术界不但要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圣经”,也要在跨文化视域中对圣经文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近现代尤其最近100年来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不断显朗,在此背景之下,《圣经》文学研究呈现出不少新的气象。

### 3. 多元阐释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趋势给文学研究带来深刻影响,一个突出表现即比较文学学科的产生和日益成熟。学者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理论,以孤立、静止的目光看待文学,而倾向在各民族文学普遍联系的网络中,以跨越、沟通、比较、综合的思路全面观察特定的对象。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势必影响到圣经文学研究。人们对“圣经文学”的内涵逐渐产生进一步的认识,意识到该术语不但指“圣经中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圣经”,还包括“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圣经》在2000年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中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从中征引典故、再现原型、汲取灵感、生发意念,培植出五光十色的异卉奇葩。解析这类作品中的“圣经元素”,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文学的特征和规律性,成为许多学者兴奋的焦点。19世纪末叶以来,这类专著不断行世,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哈代、托尔斯泰、T·S·艾略特、乔伊斯、肖伯纳等人与《圣经》的关系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仅莎士比亚就可列出诺伯(R. Noble)的《莎士比亚的圣经知识》(1970)、阿契曼(C. Achermann)的《圣经与莎士比亚》(1981)、弗莱(R. M. Frye)的《莎士比亚与基督教教义》(1963)、莎恩(N. Shaheen)的《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圣经资料》(1987)等。除了作家研究,也有人在某些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推出一批专著,如利普茨因(S. Liptzin)的《世界文学中的圣经主题》(1985)、巴特尔(R. Bartel)主编的《文学中的圣经形象》(1975)、雷耶斯(M. P. Reyes)的《现代

戏剧中的圣经主题》(1978)、弗勒(D. C. Fowler)的《圣经与中世纪英语文学》(1984)、杰弗里(D. L. Jeffrey)主编的《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辞典》(1992)等。

这些成果既更新了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也深化了对《圣经》的了解。仍以莎士比亚为例,以往的学者多谈莎士比亚弘扬希腊精神,歌颂人性、青春和爱情的价值取向。通过研究他与《圣经》的关系,人们发现,他在其全部38个剧本中都引用或化用过圣经中的典故或语句,计500多处。透过它们可以看出,莎剧与《圣经》或基督教教义也有种种联系。它们是继承和张扬“二希”传统的典范,既肯定人类的健全欲望,又推崇高尚的道德和仁慈博爱的理念,将“二希”的精髓熔于一炉;它们因此得以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前列,闪耀出永恒的理想光辉。另一方面,这类研究也有助于发现《圣经》的独特表征。例如,中国现代作家对待《圣经》的态度表明:《圣经》的观念形态至少能分出文化意象和教义内核两个层面,它的文化意象带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功效,教义内核则一般只在信徒中发生效用;对于中国现代作家而言,《圣经》的核心概念“上帝”和“基督”是文化性和教义性的,所以,《圣经》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精神启蒙、人的文学和真善美极致的追求,以及对博爱人格和献身人格的弘扬。(刘正林,1999)

除了引进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中期以来,跨文化视域中的圣经文学研究还受到另一股文化大潮即各种新兴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冲击。20世纪被称为“理论的世纪”,一系列当代文论此伏彼起,相继风靡学术界,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比如语文学、新批评、现象学、修辞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文化阐释学、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其中一些渗入圣经文学研究领域,酿成运用新潮文论观照古老经典的种种奇观。学者们发现,18世纪以来流行的“历史考据法”固然有许多合理性,科学地揭示了大量关系到圣经背景和编写过程的史实,本身却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只注重《圣经》的文献资料功能而忽略它的文艺或诗性功能,热衷于对圣经故事分割检索而不关注其文本的现存样式等。

最早运用当代文论对圣经进行成功阐释的先驱者是二战期间避居土耳其的犹太人奥尔巴奇(E. Auerbach)。他在《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描写》  
万方数据

中提出,圣经的叙事特点是简约含蓄,与荷马史诗的铺陈外化形成鲜明对比;二者虽服从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却都是伟大的文学著作;荷马史诗的美学层次虽高,内容却相对单薄,难以引起深沉的思辨;圣经故事貌似简单,实际蕴含了解读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能使人在思索玩味中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刘意青,2001)这些论断使新一代学者逐渐意识到,圣纪事能被置于世俗性虚构故事的层面,按照分析虚构故事的方式加以研究(即使研究者不把它当成虚构故事),因为当某一文本因其诗性价值成为研究对象时,历史性质的问题完全可能被搁置在一旁。

从60年代到90年代,以各种当代文论为指针的圣经文学研究全面繁荣。坡威尔(M. A. Powell)认为,圣经学术界在大约20年间就得到世俗文论界在半个世纪中才获得的新发展,“如果说圣经学者曾经落后过,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很时兴,充分占据了文本研究方法的各个领域”。(M. A. Powell, 1992)在此期间,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以及修辞学、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批评等,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坡威尔在《圣经与现代文学批评》一书中列出相关论著和论文1749种,具体介绍了各自的论点。

总之,受惠于比较文学和当代文论的丰硕成果,20世纪圣经文学研究以多元化的阐释思路和途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赢得透视自身复杂课题的新视角、新方法之际,也为文学理论建设贡献出某些文化资源。

#### 参考文献:

- [1]刘意青. 简约、含蓄的圣经叙事艺术[J]. 外国文学, 2001,(1).
- [2]许正林.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J]. 文学评论, 1999,(2).
- [3]Gabel, J. B. and C. B. Wheelr.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86.
- [4]Kummel, W. G. *The New Testament: The History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Problems* [M]. Abingdon: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5]Powell, M. A. *The Bible and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 Critical Assessment* [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责任编辑 马为民)